

勃利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勃利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于宽洪

编 摄：曹 林 权琅轩

封面设计：季格君

封面题字：程中元

目 录

陈伯村夫妇在勃利	王书田	(1)
裕顺隆的兴衰	孟继尧 曹 林	(12)
勃利翻砂史话	王玉琦	(30)
王赤戎同志是“依勃桦”地区贸易的开创者	杜西林	(36)
忆侨居朝鲜的海外生活	姜文彦	(44)
白都波同志在勃利二中	江德达	(61)
回忆我在伪满学校的生活	孟庆春	(75)
我在支应局工作期间的回忆	边振儒	(95)
我的“国兵漏”经历	蔡运杰	(101)
怀念赵庆祥烈士	汤铸石	(118)
公审匪首孙访友纪实	苏 威口述 曹 林执笔	(121)
“杨小佛”其人	王崇有	(125)
孙靖宇传略	权琅玕 杨景和 于宽洪	(134)

陈伯村夫妇在勃利

王书田

陈伯村、赵志宣夫妇离开勃利已40余载，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勃利城乡发生巨大变化无不浸透着革命老前辈为建设和巩固勃利根据地所付出的心血，他们的业绩，使人们难以忘怀。

几年来，我借在勃利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的机会，走访了当年与陈伯村夫妇在勃利一道工作过的杜灿、吴琳涛、张昭、吴堤等老同志，拜访了陈老本人，又查阅了他保存的当年工作笔录及有关资料，对他们夫妇俩在勃利的战斗生活片断有所了解。

为回忆革命先辈的高尚品质并启迪下代，笔者以秃笔淡墨书写其一二，尽管某些情节不细，或有出入，仅以此对尚健在的陈伯村同志的祝福，对已逝世的赵志宣同志的悼念。

陈伯村同志一九〇五年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一个农民家庭。读大学时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在白色恐怖年代的一九二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早期在上海、江苏做团的领导工作。领导过工人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四次逮捕入狱，过了四年又六个月的铁窗生活，第四次被捕时在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关押了将近四年之久，受尽了折磨，被我党营救出狱后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赵志萱同志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北国边陲城市齐齐哈尔市，祖父是皇戚贵族，父亲是齐齐哈尔市清丈局长，又做过直隶省督军兼省长庆家公的秘书长，被列为天津八大富翁之一。赵志萱由于被父亲遗弃而未曾尝到朱门酒肉臭的生活。她于1930年前后曾读过小学和初中。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就走向了社会。“九·一八”事变后，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赵志萱冲破封建的束缚和羁绊，为唤起民众的觉醒毅然投身于抗战救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一九三六年由杜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受党的委派和庞文华一道进行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到了延安。这位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者，在延安时与陈伯村相识，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相亲相爱，成为知己，遂结为终身伴侣。为开辟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受命来勃利，陈伯村同志任合江省勃利一分区地委书记，赵志萱同志任勃利县委组织部部长。

陈伯村夫妇虽然在勃利仅仅工作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但却给勃利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事亲自动手，做人民的公仆

陈伯村夫妇身为地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党的中层领导干部，但从无官架子，接触过他俩的人都说：“他俩对贫雇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什么官架子，从外表看不出是个大干部。”他俩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当他了解到由于土改不彻底，出现了“夹生饭”而农民没有土地耕种时，陈老马上亲自动手起草了为迅速解决土地问题准备

春耕的文件。在文件中指出：“各县、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采取一切有效办法迅速解决土地问题，以利于抓紧准备春耕。”他曾多次亲自动手给省委书记张削天同志写书而汇报，汇报勃利、依兰、双河、河钢等县扩兵、夏锄、土改试点以及传达省委群工会议贯彻的情况。在他保存的40多年的笔记本中，留有很多他在勃利的工作手记，诸如由于县大队、区中队的干部战士中混进了部分敌伪分子和出身成分不纯的人，而起草的《关于整训县大队、区中队的紧急指示》，为了打击地主、富农造谣、拉拢土改积极分子，破坏土改等问题，而制订的《地主富农管理条例》、《划阶级中的几个问题》。另外像《关于划错斗错的中农如何处理》等等，都是在勃利地委时亲自动手拟就的文件。有一次他去哈尔滨办事只需几天时间还给各县委写信布置工作，可见他对工作是极端负责，把精力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他俩的生活也非常俭朴，穿着都是普通供给制的干部服，棉袄是灰色四个口袋的兜兜服，下身灰棉裤，戴一顶普通棉帽子。夏季也是供给制的干部服，脚穿三鼻脸手工做的布鞋。吃的大部分是粗粮，吃上一餐大米、白面算是改善了生活。陈伯村同志由于监狱生活的折磨和长期的艰苦工作身体比较软弱，也和其他同志吃一样的伙食。他俩为不影响工作，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乡下一位贫农家代养，这家妇女待这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亲，照顾的非常周到，时间长一点母子见不到面，就把孩子送到街里，叫他们亲一亲，一直到他们夫妇俩调省工作后才把孩子接回。

身先士卒，发动群众搞土改

一九四六年时勃利搞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试点，但大部分村、屯的土地被地主、富农把持着，明分暗不分，仅仅仅写在花名册上，没真正分到贫雇农手里，处于“夹生饭”

“半夹生饭”状态。正如陈伯村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间写给张闻天同志的《关于贯彻合江省委群工会议情况的汇报》中指出的那样：“除研究一个村的工作外，并探讨了一个点与面结合的问题。我们意见，现时在勃利还处于真正发动群众时期，对现时点的要求只能是初期的点，工作出发点是通过试点带出一批干部，去帮助附近村、屯工作，而工作团的干部在这里取得一些斗争经验……。”陈伯村同志的汇报得到了张闻天的肯定，并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为了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陈伯村同志为顺乎民意，急群众之所急，在紧急指示中提出农民迫切要求我们给分地种，如不抓紧分地则违背了群众的意愿，我们将脱离群众。因此，根据勃利的实际情况，县干部会议结束后，将县、区工作团的干部全集中到城关区的东岗屯，青龙山区的安乐屯，杏树区的刘家屯、杏树东屯、后屯等七个村屯，后来由于城关区群众自动起来抓地主、挖浮产，县又把工作团的干部主要是城关区的干部派驻在太平街，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贫雇农对于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剥削不甚了解，对于贫困的根源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一时难以明白。为把贫雇农都发动起来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陈伯村同志首先对工作团干部进行如何发动群众，扎根串连和劳苦群众打成一片的教育。他亲自带头深入农村与

贫雇农同吃同住、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他经常讲：“群众发动不起来是由于对我们的政策、主张不摸底，群众不和我们接近，一是怕我们不为他们办事情，不为他们撑腰；二是怕地主、富农记帐，工作团干部走了，他们仍然受气。所以必须想尽办法和贫雇农交知心朋友，要他们相信我们，把他们的心里话都倾诉给我们……。”由于他的言传身教，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下乡都住在最穷苦的贫雇农家，睡在无炕席的土炕上，吃的是玉米面饼子或者面糊糊，帮助房东劈柴、担水、打院子，帮助贫雇农整地等。通过与贫雇农交朋友，晓之以理，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以“滚雪球”的办法，逐步形成了积极分子群。陈泊村同志在一九四七年春曾去东岗屯检查群众斗争情况，那时因身体弱，不能骑马，只好坐当时仅有的大胶皮轱辘车，调查研究土改斗争情况。他在七月一日给洛甫同志的信中写道：这次工作团去东岗屯只有十多天，经过说服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斗争了李××，开始斗争时有顾虑，怕斗不彻底，斗不倒将来要报复，群众提出要枪毙他。根据李××的罪恶事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时，群众的斗争情绪就更高涨起来了，群众自动地又斗争了姚永孝，接着逮捕了王××等3人，在李××家搜出衣服90余件，没收了好地23垧、草房5间，牲畜3匹，东岗屯的土改斗争打开了局面，打倒了封建势力。土改工作团在杏树东屯、后屯，经过扎根串连，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教育，贫雇农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开始接近工作团干部，并向工作团干部反映情况：“没有粮食吃，种地挂口少，有牲畜的还没有饲草和马料，地也没趟好，地主王××用小米喂马，人家大肚皮（地主）还天天吃大米、白面”。又反映：“工作

团干部去县开会大肚皮在屯中说怪话”。他们不但敢反映情况，而且提出了打倒地主，挖他们财宝的要求。工作团干部抓住群众的要求，在贫雇农和积极分子中进行酝酿，查地主阶级的“发家”史，查他们的罪恶，通过给地主算细账，诉贫雇农受剥削受压迫的苦，激发了群众斗争地主、富农的积极性。掀起了斗争高潮。白天抓地主、富农，起衣物被服、家具等浮产，晚间召开大、小会议诉苦。当时工作团干部普遍地教唱有诉苦内容的歌曲，很能激发受苦人们的思想感情，群众积郁多年的苦水倾吐出来，把仇恨集中到恶霸地主和大、中地主等剥削阶级身上，彻底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揭发了地主、富农的造谣、欺骗、拉拢等破坏土地改革的罪恶行为。贫雇农越诉苦越来气，有的泪流满面，强烈要求挖他们的财物，有的要动手以平心头之恨。杏树乡的杏树东屯、刘家屯的贫雇农把地主捉起来关在禁闭室内，斗争了恶霸地主董×，把罪大恶极的王××枪毙了，打垮了大地主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在这七个村、屯和太平街就斗垮了30个恶霸地主，没收了地主和富农的多余土地分配给无地的贫雇农，挖出浮产有马、牛214头、被服14513件、粮食329石（一石合七百市斤）、黄金54两、布7085尺、钢枪7支、子弹6,000余发、大车107台、拉客的二马车子35辆、白银40余市斤、其它牲畜682只、白金32克及其它许多物资。通过这次斗争，贫雇农扬眉吐气，在政治上提高了阶级觉悟，组成了贫雇农自己的组织贫民会，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使地主阶级的威风扫地。在经济上贫雇农得到了实惠，分到被服、家俱，生活受到了补益，不致于赤身露肉了。通过这次斗争锻炼、提高了工作团干部领导群

众运动的能力，取得了发动群众搞土改的初步经验，经过斗争涌现出 50 多名积极分子，成为各村屯的基层领导骨干，为以后的全面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伯村同志在勃利工作期间，也曾到双河、倭肯、杏树等区检查工作，亲自听取干部的工作汇报，召开贫雇农座谈会，了解土改斗争进程，肯定、表扬他们斗地主、挖财宝的行动，鼓励他们进一步的把地主、富农的财产挖净，彻底翻身。不但贫雇农要团结起来，还要和中农团结在一起。座谈会上大家听了他的讲话，都觉得耳目一新，鼓舞了搞土改斗争的积极性。

筹集资金，支援省委

一九四七年春夏之季，合江地方土地改革有的地方轰轰烈烈，有的地方刚刚开始，大部分土地仍被封建地主所把持。农业生产力没得到解放；工业遭到日寇的破坏没完全恢复；商业资本家对党的政策不托底，南北交通中断……等。当时，合江地区在战略上成为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根据地，无论人力、物力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援前线，因此，地方财政非常困难。

为了解决省委财政开支的困难，陈伯村同志积极筹集资金，在县委书记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形势是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大反攻的关键时刻，必须顾全大局，支援前线，支援省委。通过动员，桦南县委给省委送去 10 两黄金，勃利县委给省委送 500 多万元现金（约合 10 两黄金），依兰县委也积极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送往省委，为省委分担了困难。

为了解决地方财政上的困难，他积极协助省委在勃利、倭肯等城镇开办裕华公司，除沟通城乡物资，繁荣经济外，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地方上财政的困难。

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参战

一九四七年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前方需要大量兵员。陈伯村同志当时既抓发动农民搞土改、建党、建政，又抓支援解放战争，发动农民参军参战。他经常教育县、区干部，要做好扩兵工作，在扩兵工作中不要强迫命令，要通过诉苦进行阶级教育，提高青壮年阶级觉悟，宣传前方作战的胜利成果，鼓励青年参军参战，公开号召参军上前线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保卫贫雇农的政权。经过宣传教育，贫雇农中的青年积极要求参军、参战。掀起了父母为儿子报名，媳妇送丈夫参军，兄、弟相争去前方的高潮。各县、区都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扩军任务。正如陈伯村同志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给洛甫书记的信中提出：“这次扩兵工作在数目上全分区各县都超额完成了任务，桦南县太平镇从190名中选出了150名，进行了比较深刻地阶级教育，通过诉苦挖穷根，新兵情绪都很高。在诉苦中大部痛哭流涕，并以班、排、连分别酝酿，召开上前线誓师大会。刁翎给60名任务，却完成了108名，勃利除完成任务数外，超额100余名，除一部分补充县大队外，一部分等待下次再送前方”。一九四七年仅勃利县就为前方完成1895名扩军任务。

为使去前方的战士无后顾之忧，对军属实行代耕，以解决劳力的不足，对新战士家属生活困难都做出妥善安排，达到去的安心，留下的满意。由于战士没有后顾之忧，到部队

后都积极工作，英勇杀敌，有很多人立了战功，有的后来成为部队的各级指挥员。

为支援解放战争，还动员农民晒干菜、做军鞋，以补助军需物资的不足，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注意培养干部，关心群众生活

赵志萱同志在凌海区张家街、连珠岗搞调查时发现有的干部要求“换肩”，她掌握了这种不健康思想之后，没直接找他们提出批评，而是深入调查了解，分析干部存在“揩摸手”思想主要原因是农村干部阶级觉悟不高，只顾当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一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和公误工以及家里“征调”等情况而产生的。针对这有思想召开了干部会议，组织座谈，启发教育，她讲了六一党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提高了干部思想认识，坚定了工作信心，有的村干部说：“听您这一讲心里亮堂多了，不换换肩，得好好干到底”，从而扭转了干部怕责任，怕挨工要“打乱子”的错误思想。

陈伯村同志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30多名贫雇农积极分子，十分关心，热心教育，大胆使用，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他们，使他们逐步成长起来。凌海村的吴德平、郭玉林、大西站地河屯的张林、高台沟史士有、渤海镇东岗屯的张万峰等同志，后来都成为区长、党支部书记，有的被上调到地区和省里去工作。

陈伯村夫妇对群众的生活、生产等问题也非常关心，要求翻身后农民腾荒造田，节约开支，发展生产。赵志萱同志在连珠岗搞调查时发现合作社不到几个月时间，卖出自酒

的金额达 800 多万元，感到翻身不久的农民竟如此浪费，随即召开了贫雇农座谈会，以算细帐的办法教育农民。她讲：“这 800 多万元都喝掉了，是多么大的数字啊！如果投入到生产上可买 80 匹牲口，对生产能起很大作用，多可惜啊！”与会同志受到极为深刻的增产节约教育。有的群众深有感触的说：“共产党干部真好，说的在理，不只是领导我们翻身，还告诉我们勤俭过日子，把钱花在正道上”。同时她把这个问题写给了陈伯村同志，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又建议省委对农民勤俭过日子作出几条规定。

赵志萱同志也满腔热忱的关心群众的文化教育和青年人的婚姻问题。在连珠岗蹲点搞调查期间，对农民不积极支持子女上学读书的进行说服教育，启发农民从长远利益着想，送孩子入学读书。她说：“我们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还要在文化上翻身。”经过宣传教育，连珠岗的贫下中农的子女大部分都入学了，在 300 多名学生中，贫雇农孩子占三分之二还多，地主、富农子女不足三分之一，改变了过去地主、富农家的子女占学生数的三分之二的现象。她也非常注意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废除，教育农民姑娘出嫁不要彩礼，不准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结婚时不要大操大办。在工作组和干部的宣传教育下，当时这个村有五对青年男女结婚都没要彩礼，并且是自由对象。结婚时改拜天地为向毛主席像敬礼，改雇鼓乐吹吹打打为小学生敲锣打鼓扭秧歌以表示祝贺。过去贫雇农家穷娶不起媳妇，而连珠岗村土改后结婚与订婚的 15 对男女青年中，女青年中农成份的 9 名，贫农 3 名，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 3 名，男青年贫农 13 名，中农成份的 2 名，贫雇农再不愁娶不上媳妇了。

陈伯村夫妇在勃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们的足迹却永远留在勃利城乡大地，和勃利县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他俩离开勃利走向新的征途时，很多人前来送行，人们不约而同的喊：“陈伯村、赵志萱二位领导同志再见！请二位领导常来。”四十二年过去了，陈伯村夫妇自离开合江后，没有再来勃利，却给勃利县人民留下了永远的怀念。

裕顺隆的兴衰

孟继亮 萧林

勃利县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知道解放前后，勃利工商界有“六大家”，而王趾瑞的裕顺隆即居其首。他，没有大来新经理高瑞林的声望，也没有汇丰昌掌柜李梦飞的各样头衔，是个不出头露面，不善交际，鲜为人知的地主兼资本家。他拥有土地三千多垧，房产四处，是勃利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大房主。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都有他的分号，堪称勃利首富。虽然他经营的米厂、粮栈规模不如合升利；油厂的产量不及东烧锅；商店门面赶不上大来新。但他资金雄厚，达 15 万哈大洋，比元发火磨和汇丰昌两家的总和还要多，相当于大来新、合升利资本总额的三倍，是“六大家”中唯一独资经营的大财东。

发 迹

王趾瑞原名王昭麟，原籍辽宁省凤城县西杨木沟村。其父王振邦是一位不辞劳瘁秉性温善的旧式农民。有六个儿子，老大、老三天折，领着老二王昭义、老四王昭麟、老五王昭凤和老六王昭明下田。租种外号王四聋子的三、西垧地。终年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以求温饱，遇上旱涝灾害仅能维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苦日子逼的老王头下狠心要改换门庭，让天资较灵敏的四儿子王昭麟去读书，欲走仕宦之路。不曾想，几

年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梦想成为泡影。王振邦把王昭麟叫到跟前说：“小四！从今天起你不要去上学了，咱们认命，还是跟我种地吧！”可是这个王昭麟熟读孔孟。几载寒窗，已不适应耕作了。即便勉强随父亲到地里，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悒郁不快，憧憬寡言。

正在这时，从黑龙江来了一位叫刘振家的亲属，问起他们的生活状况，王振邦只是摇头叹息，其面部表情酷似鲁迅笔下的闰土。

刘振家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想法挪动挪动呢？”

王振邦说：“要能离开这穷窝倒好，拉家带口的上哪去呢？”

刘说：“我劝你们上北大荒吧！”

那时的北大荒真是名符其实的荒啊！豺狼出没，渺无人烟。凤城人除了知道那里有个三姓外，还听说有个蜂蜜山，就是现在的密山，其它的县份就闻所未闻了。

刘振家继续说：“这几年我在三姓陆续盖了两处窝棚，买了两方地，一方地是四十五垧。如果你们去的话，我把上窝棚三间草房连同一方地按原价兑给你们，你们再雇洋犁多开点。那边荒地有的是。趁着你身子骨还硬朗，领着儿子拼命干它几年，包管日子大变样！”

那时勃利尚未建县，他所说的三姓两处窝棚就在以后的勃利、七台河一带。

刘振家的一番话说的王振邦动了心，全家人也都围拢过来热烈争论，只有王昭麟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等人们问到他时，他才开口：“老辈人常说‘人挪活，树挪死’，我看咱家

人多地少，又有劳动力，去北大荒最合适，既然那边有地可开就会有办法，何况还有刘叔叔的大力帮忙。要走就赶紧准备，谷雨到达还不误农时。”

年轻人愿意出去闯闯，都赞成老四的意见。经过周密商量，积极准备。王振邦带领全家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旧历二月中旬的一天，坐上大车，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三月中旬来到了七台河太和屯。

刘振家真够义气，不食前言，热情帮助老王头把家安顿好，又帮助他们雇洋犁开了一些荒地，及时选种下播。

从种子落地开始，王振邦领着儿子们深耕细作，精心侍弄。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秋天就获得了丰收。除去一年口粮和牲畜饲料外，净挣五百多元，真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在凤城连想也不敢想的收入呵！都夸老四眼光准。全家更鼓起劲头，在附近又购置了几方地，由于辛勤耕耘，天时作美，秋后的收成仍是囤流仓满，五谷丰登。

消息很快传到了凤城县，真可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乡的老邻少友纷纷来投奔；有租王家地种的；有到他家吃劳金的。收租买地，地又出租，象滚雪球一样，几年的功夫王家就发达起来。盖上了砖瓦房；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前面又盖起了五间门市房。用土坯子垛成一个大四合院，成了远近闻名的王家大院。

在这偏僻的山区，各家农户住的非常分散，离县城又远，购买生活用品很不方便。王昭麟便在门市房开起一个杂货店，名为王家小铺。销售各类日用杂货，兼收购土特产品。与此同时，王昭麟把大号改为王趾瑞。